

# 奔驰接藏獒散发的是暴发户思维

↓ 天价藏獒 炫富还是作秀 新华网 9月11日 作者 符玉瑶

## 【新华网一评】

在普通人眼里,30辆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轿车鱼贯驶入国际机场停车场,那的确预示着有贵客临门。所以,“是不是哪位国家领导人要来西安?”“应该是某位明星来了吧?”——有这样的议论,是很自然的。而当所谓的“贵客”忽然间变成了一只狗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在惊愕之余,发出会心一笑,就像一出喜剧的开头,以庄严始,以滑稽终。其实许多魔术不正是惯用这种伎俩吗?所不同的是,这出戏的演员,都是些衣食无忧、钱多得发愁的主儿,是“獒友协会”的“藏獒的爱好者”。在我印象中,富人都是打高尔夫球的,什么时候改养藏獒了?当然,二者也并不矛盾。不过,当

富人把自己的爱好铺排在公共场合时,招人议论,也就无所难免了。

陕西省税务干部学校一名等亲友的先生说,来这么多的车,能不花钱吗?这样的排场不能提倡!立马就有网友说——什么叫做不能提倡?人家有那个钱,只要不偷不抢,人家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人家的奔驰就是开去耕地也是人家的事儿,指责别人,是典型的仇富心理。

但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似乎一议论富人,就是仇富。其实,中国人仇的是不正当的致富,仇的是为富不仁,仇的是社会的不公。有钱人花钱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他的钱来得干净。有谁仇过袁隆平?有谁仇过姚明?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靠勾结权贵、垄断资源等不正

当手段暴富的人被人仇视,恰恰是民众正义感的体现。至于暴富之后又炫富的行径,受到仇视,更是咎由自取。

富人们当然有花钱的自由,甚至有炫富的自由。但是,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严峻现实下,富人们把取之于社会的财富用于社会,做一点慈善事业,关注一下贫困山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岂不更好,更有意义!

其实,我愿意相信那些开奔驰迎藏獒的富豪们只是一只商业炒作的棋子。

## 【现代快报再评】

“是不是哪位国家领导人要来西安?”“应该是某位明星来了吧?”作者说有这样的议论,是很自然的。我觉得不自然。如果是领导人这样摆

谱,那比迎天价藏獒更可耻,因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改革开放前,有重要外宾来,就不计成本安排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长安街两边挥旗迎接,现在已与国际接轨取消了;国家元首级的贵宾一般也只在天安门广场或人大常委会举行仪式。如果是迎明星,那跟迎天价藏獒差不多,当然不违法,但也不可取。

孔夫子说的“富而不骄,穷而无怨”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实现。暴发户们除了显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不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而穷人不信天命八字了,又很难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正对待,情绪能平静吗?所以,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很重!应该是富有的人最怕社会不和谐吧,俗话说“打赤脚的还怕穿鞋的不成?”

## “视而不见” 是因为人微言轻

9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听课时指出了地理教材中的错误——该校选用的地理教科书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9月10日新华网)

↓ 谁对地理教材14年的错误视而不见 中国青年报 9月11日 作者 张贵峰

## 【中国青年报一评】

究竟是什么让教材错误如此频仍呢?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一个编撰者水平能力和责任心的问题,但追根溯源,症结实际上还在于:目前仍然高度权力化和垄断化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从教材的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均由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社一手包办。这导致,一方面,民间力量很难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发行过程中,以形成有效的教材竞争,同时,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也使教材的整个形成过程脱离了大众监督。另一方面,教材的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教材问题上的主动选择权,很难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自主选用不同教材。

众所周知,凡垄断必然会产生“质次价高”的问题,以权力为背景的教材垄断当然更不会例外。一方面是,编撰粗糙、错误百出,另一方面又是教材暴利的横生、泛滥。据悉,“要发财,印教材”已成为一个公开的行业秘密,教材的实际利润率高达45%~50%,仅2004年一年全国就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问题落马”。

南山的亲人当然知道他不收红包,但同时也认定钟南山这样的人极少,不送就心不安。

可见榜样的力量是很有无限的,所谓“形势比人强”。曹林说“王石的存在则传播着这样的象征价值,王石没有行贿,他也并没有吃亏”,看来他还相信榜样的力量,而据我从报道所知,深圳人就不信,说王石的不行贿不过是“瞒天过海”,让代理公司行贿拿地而已。作者说要“从囚徒困境中突围,需要人们相信:如果不行贿,也不会吃亏,而且会更好地生长、更多地创富,靠行贿并不能健康地发展。”这话不错。这首先需要司法机关守住底线,严惩行贿受贿者。做到吗?那好,请我们的司法机关立案从美国司法部公开举报的中国国企受贿案查起吧。

# 王石不行贿,你信吗?

↓ 为何很少有人相信王石不行贿 西安晚报 9月11日 作者 曹林

## 【西安晚报一评】

行贿是违法的事情,不行贿仅仅是不做违法的事情,最低的法律标准为什么会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为什么遵守法律底线的“不行贿”会成为大新闻——这其实预设着一个前提,就是行贿已成默认的潜规则,行贿已经被去道德化,不被视为一件羞耻的事。这种语境中,很少有人相信王石的“不行贿”宣言和承诺,尤其是王石身处房地产业,这实在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

行贿之所以那么严重,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权力真那么腐败,风气真那么恶劣,并非每个掌握着一丁点权力的人都在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地索贿,而在于公众长期在行贿氛围中养成的一种集体焦虑:就是不相信别人不行贿,

不相信别人会通过平等竞争和遵守规则赢得资源,总认为其他人一定在背后找关系塞票子,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定会以行贿这种方式占据竞争优势,一定会想方设法收买权力赢得先机,而且这种怀疑不断被一些传闻和丑闻所印证和强化。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促使许多人积极地去行贿。

正是在这种焦虑下,即使平常很老实本分的人,当遇到孩子上学、子女就业这样的事情时,也会厚着脸皮去走走关系送送礼,不送礼会感觉很不安心,送礼了,别人也收了,即使没有什么用,自己也会安心。因为他们潜意识中相信别人也会这么做,不相信别人不行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不相信别人不行贿,所以自己才会去行贿,社会上行贿的

人越来越多,不断印证自己的怀疑,加剧了在“不行贿”上的怀疑,就更会去行贿。很少有人相信王石的不行贿承诺,就是这种社会焦虑的反映。

这很像一个道德上的囚徒困境:只有选择行贿,自己才会不吃亏。而每个人坚持自己对别人的怀疑,只能使囚徒困境越套越牢越陷越深。如何走出这个“他人即为地狱”、“别人必在行贿”的道德困境呢?这正是王石的意义,需要王石这样的坚守,“很少有人相信”正是王石坚守的理由。

## 【现代快报再评】

人们不是简单地根据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的新闻来认知国内现实的,而是根据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经验。所以超级名医钟南山说,他的家人也问他在医院要不要送红包。钟

# 一把手为何热衷戴博士帽

↓ 一把手攻读博士是否学历批发 红网 9月12日 作者 何耀超

## 【红网一评】

早就听说现在的官员喜欢读书,文凭越来越高,想不到重庆市许多官员都在攻读博士。当今是知识经济年代,官员喜欢读书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说明他们积极向上,有责任感使命感。

但是,有的官员读书似乎只是为了更好地升官。社会上唯文凭论根深蒂固,一般认为文凭高能力就强品质就好。考察提拔一个人,其文凭容易得到垂青。有的地方比较推崇学者型官员,觉得一个人有博士文凭就是学者,满腹经纶,一定能够把地方的经济社会搞得更好。读书是苦差,部分官员热衷读书,乃出于个人仕途的考量。

攻读博士应该比较难,重庆市众多官员都在读博士,至少说明读博士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难。以前的博士生寥若晨星,随着大学不断扩招,博士生从个别培养到批量培养,博士生已不再稀罕。很多官员的大专和本科文凭是通过地方

党校取得的,根本没难度。他们攻读博士相信也是畅通无阻,轻而易举拿到博士文凭。可以说,有的大学专门为官员攻读博士提供方便,若有人很难毕业,其他官员就不会在该大学读书,都转到其他大学了。大学既担心得罪官员失去各种资源,又以有学生多当官和当大官为荣,批发博士帽给官员就显得很随意。只要攻读博士都能顺利毕业,官员乐此不疲,攻读博士之风也就应运而生。

官员攻读博士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差钱。每年高考后,全国各地都有学生考上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但是,有谁听说官员攻读博士因缺钱而作罢?读书需要多少钱,他们毫不在乎,甚至论文可以花钱请人代写,考试可以花钱请人代考,还可以花钱和大学老师拉拢关系。当然,所花的钱究竟是谁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倡导读书,官员攻读博士,确实有

一部分是想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应当赞赏。同时,不少官员攻读博士是另有目的,比如为了升官和作秀,那就另当别论。

其实,官员没必要都去攻读博士。官员每年的学习并不少,只要认真学习,就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只是一些官员不把学习当成一回事,有的经常缺席,有的是打瞌睡,对真正的学习不感兴趣,喜欢的是游山玩水式的“学习”,喜欢的是灯红酒绿式的“学习”。学习机会和学习内容很多,却什么都没学到。正如个别官员,在台上慷慨激昂要反腐倡廉,在台下大搞钱权交易锒铛入狱。官员都攻读博士,难道真的学到知识?相信很少有人相信。

## 【现代快报再评】

这个话题并不新却常被提起,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不要拉“社会”来“陪斗”,说什么“社会上唯文凭论根深蒂

固,一般认为文凭高能力就强品质就好”,这话连作者自己都不信,后来要补一句“官员都攻读博士,难道真的学到知识?相信很少有人相信。”“考察提拔一个人,其文凭容易得到垂青,相对来说具有优势……”这“考察提拔”是组织上的事,与群众有多大关系?《中国青年报》9月9日有篇《老校长痛诉象牙塔的倒掉》的报道,说老校长问一青年教师:“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了,还考什么?”

“代别人考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业论文呢。”副教授笑道。老校长这才恍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老校长曾将这些情况向一些高校的领导反映,有些高校校长则告诉他,“现在这些情况没办法收拾,你这么大年纪就别去搞了”。人们关心的已不是这些问题本身是否合理正义,这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而是这种局面如何收拾,谁来收拾。

## 【现代快报再评】

第一,我不相信14年来没有人特别是任课教师指出错误,而是人微言轻,有权的人根本不在乎。总理指出当然不一样了。第二,除了权力的傲慢,就是利益的纠结,印的书出错要改必有损失,人家一点也不愿意承担。记得有个孙姓女演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面质问教育部长周济,京剧进课堂为什么没有采纳他们这些京剧专家的意见,而是搞了那么多“革命样板戏”?周部长的回答就是,书已印了什么的。第三,仿一句名言,“一家垄断,遍地是灾”,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